

92年前,当文学研究会呱呱落地时,曾经摄影一帧留念。由其原版洗印出的照片,现有一张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它原属郑振铎所有,郑亲手为它命名并题签:“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一九二一、一、四、于: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***”(此处为一孔洞,字与纸一同被挖去——笔者注)惠存 弟郑振铎赠”,并在照片的上、下、空白处对应着照片中人的位置写下了他们的姓名,自左至右依次是:(前排)郭梦良、杨伟业、黄英、王统照、瞿世英、易家锥、(中排)江小鹤、白蠊、许光迪、范用英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(后排)王星汉、郑振铎、宋介、许地山、李晋、苏宗武、耿济之、孙伏园。一群志存高远的青年人,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之梦济济一堂,共同筹划着意在旋转变乾坤的宏图伟业。一张照片,留住了一场风云际会。

然而照片摄入的并非文学研究会之初的全班人马,最起码缺少了瞿秋白、周作人、沈雁冰、叶圣陶等四员“大将”。但即便如此,所摄也已经是“诸‘家’荟萃”:朱希祖——史学家、蒋百里——军事家,孙伏园——编辑家,耿济之——翻译家,瞿世英——教育家,黄英(庐隐)——作家,许地山——杂家(他不仅写小说写散文,还研究宗教史,关注印度哲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,掌握梵文、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、甲骨文等等。他编的梵文辞典虽因各种不可抗力而夭折,但他为此制作的一大撷梵文词条卡片已于1990年代后期成为文学馆的永久收藏),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位——集作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、文学史家、艺术史家、收藏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郑振铎——文学研究会的成立,正是他精心运筹多方活动的结果。

郑振铎(1898—1958),浙江温州人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,他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,遂以学生代表身份投身革命洪流。待运动落潮,又回到学校。依旧是学生,依旧高高瘦瘦的,依旧戴着深度近视眼镜——形容依旧,思想却无法“依旧”了。他在憧憬,在探寻,在思考着怎样把新文学家们组织起来共谋发展。这是一项事业,一个人是干不成。郑振铎深明此理,所以谋求同道成为他千里之行的第一步。1920年中的多少个傍晚,他都是约了同样不喜欢在斗室中闷坐的朋友共同度过。他们边走边谈,徘徊于北京沙滩一带。“一谈就扯得很远,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比较多,言必称三代的毛病,在当时似乎要犯得少一些。有时又拉得太近,尤其在上一俯一仰,月光如水,人影在地,当前景色成为谈话资料的时候,有时恬适,有时感慨,甚至有时也吐些狂言……”当然,所谈的,也有一部分计划怎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。”(见郭绍虞《“文学研究会”成立时的点滴回忆》)参加交谈的,不外瞿秋白、耿济之、瞿菊农、王统照、许地山等,后来又加入了郭绍虞。交流对撞出了火花,见解达成了共识:创办一份文学杂志,以“灌输文学常识、介绍世界文学、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”(引自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

当此之时,白话文已经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

文献文物中的文学研究会——从“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”说起

□许建辉

渐成新风,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所出书籍却仍以文言为多,终于导致销路日穷效益疲软。特别是其麾下的《小说月报》,自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(1910年8月29日)创刊后即风靡上海滩,不想却也为语言的老化而致使订户递减。凡此种种,让“老总”张元济认识到文字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,随即携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专程由沪至京,登门拜望胡适以寻求扶危良策。胡适肯定了他们的改革动议,并支持这改革从《小说月报》开始,具体措施是主编换人,用提倡白话文的学者名流为《小说月报》主政。

商务印书馆掌门人抵京求援的消息,有朋友告知了郑振铎:郑振铎随即通过学界朋友蒋百里关系,得以偕耿济之一起拜访了张元济和高梦旦,当面向他们毛遂自荐,表达了想投在商务印书馆门下,主持编辑一份新文学杂志的愿望。商务的两位决策人态度很审慎,“以文学杂志与《小说月报》性质有些相似”为理由拒绝了他们,“只答应可以把《小说月报》改组”(见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

遭遇拒绝,郑振铎反而情绪高涨,因为张元济要改组《小说月报》的打算,让他感到自己久蓄于心的想法,正在因此而变茫远为切近,变朦胧为真实:“先办一个文学会,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”。这是一个新的构想,新的构想又驱动了新一轮的奔波。所幸张元济更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干的人,他回沪不久,王统照即接到沈雁冰的信函,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方案,《小说月报》指定由他接编,“只是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,名称却不能改为‘文学杂志’”(见茅盾《我走过的道路》)。但已经足够了。对于郑振铎来说,沈雁冰的来信恰似风雨之东风,使他心中的蓝图就要变成现实,一个新文学组织即将应运而生。接下来的工作,立刻紧锣密鼓了:

1920年11月29日,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,郑振铎召集朋友们开会,“议决积极的筹备文学会的发起,并推郑振铎君起草章程。至于《小说月报》,则以个人名义,答应为他们任编辑之事,并以他(它)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,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”(《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(第一次)》)。会后,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冰,报告了会议决议,并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学研究会。

1921年1月4日,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。会议通过了会章,选举了职员,宣告今日周作人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郑振铎、耿济之、瞿世英、郭绍虞、孙伏园、沈雁冰、叶绍钧、许地山、王统照等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。12人中除许地山与王统照一为台湾省一为山东

省人外,余者的籍贯不是浙江就是江苏。其他姑且不说,只就此事而论,江浙的一代“才子”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大,也可谓首屈一指了。遗憾的是最早参与文学研究会“蓝图”设计的瞿秋白,此时因远赴“饿乡”而与“发起人”失之交臂。为弥补这无可弥补的损失,郑振铎亲手将“瞿秋白”三个字写进了正式会员名单,并按登记顺序排号为第“40”。瞿秋白归国后完成的《饿乡纪程》和《赤都心史》,郑振铎也为之收入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予以出版——此是后话。

1921年1月10日,《小说月报》第12卷第1期出版。期号虽仍旧序,主将却已换人——沈雁冰正式履职主编,亲手作《〈小说月报〉改革宣言》公告未来:“小说月报行世已来,已十一年矣,今当第十二年之始,谋更新而扩充之,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,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,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;旧有门类,略有改变……”。

这是一本大的文学刊物与一个大的文学人组织联袂登台的开始。《文学研究会宣言》,就刊发在这一期《小说月报》上。《宣言》申明研究会成立是缘于“三种意思”:一是联络感情。二是增进知识。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。《宣言》坦然宣告:“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,现在已经过去。”在沈雁冰看来,《宣言》中只有这“宣告”“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”,虽然“这态度在今日看来,自然觉得平淡了,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,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应和”,所以它“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,并且也是成立以后就‘锋芒毕露’地成立了几个地方分会而地方分会又出版定期期刊的主要原因”(见茅盾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〉导言》)。

此后,《小说月报》俨然成为“文学研究会”的“机关刊”,其主要撰稿人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。在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及戏剧、儿童文学、译丛、创作批评、文学家研究、现代文坛杂话、读书杂志、随笔等栏目下,刊发了冰心的《超人》,许地山的《缀网劳蛛》,庐隐的《海滨故人》,王统照的《沉船》,叶圣陶的《潘先生在难中》,丁玲的《梦珂》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施蛰存的《绢子》《将军的头》,穆时英的《南北极》,茅盾的《幻灭》《动摇》《追求》《虹》,老舍的《老张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《二马》,巴金的《灭亡》等小说以及朱自清、闻一多、王统照、梁宗岱、徐雉、朱湘、汪静之、徐志摩、李金发等人的新诗创作。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金事,北洋政府“文官法”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团体,据说这是他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

因,却并不妨碍他的《端午节》《社戏》《在酒楼上》等作品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。总之,由沈雁冰主政的《小说月报》犹如一方阵地,文学研究会借此集合起一支年轻健壮的文学新人队伍;《小说月报》为文学研究会提供驰骋空间,文学研究会为《小说月报》注入新的生命。二者相依相携,共同为创造新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然而,《小说月报》毕竟不是“文学研究会”的“机关刊”,对于文学研究会这个松散的学术团体来说,拥有一块能够挺直气壮地树起自身旗帜的地盘,实在大有必要。于是又经郑振铎的一番奔波之后,真正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《文学旬刊》在上海诞生。该刊设论文、创作、译丛、传记、文界界消息、文艺丛谭等栏目,发表的作品主要有:茅盾的重要论文《论无产阶级艺术》,徐玉诺、汪静之、焦菊隐、黄远初、徐雉、李金发、刘延陵、倪貽德等人的新诗,王统照、卢隐、叶圣陶、严敦易、彭家煌等人的小说,朱自清、瞿秋白、王以仁等人的散文小品,熊佛西、顾德隆等人的剧本,歌德、海涅、王尔德、左拉、莫泊桑、普希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安徒生、泰戈尔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文,等等。

《文学旬刊》初创于1921年5月10日,终结于1929年12月22日,共出380期,历时8年又7个月。其间几次更名兼“易主”,具体情况是:问世时以文艺副刊形式附于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印行,出满80期后,从第81期起更名《文学》,改为周刊;第172期起又更名为《文学周报》,脱离《时事新报》,由文学周报社独立发行,第251期起改由开明书店发行,第351期起又改由远东图书公司印行。主编名义上由郑振铎、沈雁冰、谢六逸、叶圣陶、赵景深等相继出任,而真正“始终负责者为徐调孚”(茅盾语)。但不论由谁主编,也不论由谁发行,该刊始终不改其志,坚持以丰厚的编辑刊发成果践行它初创时的《宣言》:“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,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,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,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,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,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。”

像任何改革都不会风平浪静一样,《小说月报》的改革理所当然也遭遇到抵抗与攻击。沈雁冰因为首当其冲受敌,不得不于主政两年后即去主编职务。所幸接其任者是郑振铎——《小说月报》仍然掌握在文学研究会手中。从1923年1月第14卷第1期始,至1931年向商务印书馆辞职止,郑振铎主编《小说月报》将近8年(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他曾远走欧洲避难,期间主编工作由叶圣陶、徐调孚二人代理,但主编名义仍属他所有),付出与贡献该是非同一般。其中与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壮大有直接、重大关系者,当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,编辑、出版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一事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2000年以前入藏的图书中,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初版本只有40余种,不到丛书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,其中包括小说、诗歌、

戏剧、散文、传记、文艺理论、作家研究、寓言与童话等多种类别。编辑者的大视野、大胸襟、大目标、大追求由此可见一斑。该丛书以1922年5月至1929年4月为出版繁荣期,起迄时间与《文学旬刊》之始终略有先后。入选作家作品既有“五四”文学革命初期的沙场老将刘大白及其诗集《旧梦》,也有被“五四”惊雷震上文坛的后期之秀冰心及其《繁星》《春水》,有徐玉诺的《将来的花园》,有李金发的《为幸福而歌》,有王统照的《春雨之夜》,有顾一樵的《芝兰与茉莉》,还有梁宗岱的诗集《晚祷》、张闻天的长篇小说《旅途》、罗黑芷的《醉里》、叶绍钧的《火灾》、耿济之译莫泊桑《遗产》,侯曜著《复活的玫瑰》《二马》《赵子曰》《老张的哲学》属老舍所有,《追求》《动摇》《幻灭》是茅盾的“三部曲”,鲁迅贡献的是译著《工人绥惠略夫》与《一个青年的梦》,郑振铎翻译了《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》……

其中要特别一提的是庞祖龙的《寒星集》,一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的合订本,1934年3月出版,印1000册,是“江南文学研究会发行”而非“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”。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,因为稀罕而弥足珍贵。“文学研究会地方分会”存在着并且有活动——它似乎在述说着这样一个事实,同时也证明着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的影响之深之广之被接受被喜爱,否则就没有仿效的必要了。更有意思的是,该书封面上还有两行充满敬意的钢笔字:“先进作家谢蛰莹先生指正 请赐批评并予介绍 虎祖龙敬赠”。按说它应该经由冰心之手捐赠文学馆,却不知为何竟跑进了“唐弢文库”中。

综上所述,关于文学研究会诸事,茅盾、叶圣陶两位“老会员”致友人函中的述说具有结论性价值。叶老说:“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生。当时邀集发起人,在北京成立,皆郑先生主之。”“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,未复举行其他会议。若是,则此会之组织松散,可以想见。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,惟在出一套丛书,以及编辑《文学旬刊》(后改为《文报(学)周报》)而已。”茅公则说:“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,实际并无组织活动,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西。先是《小说月报》为代用机关刊物,后来在沪会员自费出版《文学旬刊》,最后连《文学旬刊》也给开明书店出版,在沪会员止(只)负编辑之责。此外,则有丛书,由商务出版。这些书,都是郑振铎负责,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。”

茅、叶两位先贤几十年如一日谦虚谨慎功高不居,其大师风范让后人高山仰止。两人所言相互补充支持,合力证明了郑振铎实为文学研究会中的最核心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后此公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,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,途中飞机失事遇难殉职。虽说离世过早易与后人相隔膜,但一个真正有功于祖国有功于民族的人,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的。

文学研究会的“别动队”

——孙伏园与报纸副刊

□张 丹

1920年代的新文化传播阵营中,活跃着一支异军突起的队伍——报纸副刊。其领军人物,就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、史称“副刊大王”的孙伏园。

孙伏园(1894—1966),原名福源,字养泉,笔名福庐、柏生、桐柏、松年等。浙江绍兴人。1910年代初期在家乡“山会初级师范学堂”读书时,幸遇鲁迅出任学校监督(校长);1920年代初期进北京大学深造,又恰逢鲁迅在北大兼职。一生两次受教于鲁迅,虽时间短暂,却获益终生。他的副刊编辑生涯,是从北京《晨报》开始的。

《晨报》是《晨钟报》之嗣,创始人李大钊。原来的第七版是一个专门刊载文艺作品的版面。孙伏园受邀为该版主编后,拟将该版扩一为四页且单独发行,名称定为“晨报附镌”。得到主政者批准后,即请书法家用隶书体题签报头。就书法说隶书字中于是有“附”字,要写得像以“副”易“附”。于是“晨报·附”镌”变成了“晨报·副”镌”,豁然出现在1921年10月5日的报头位置上。

“副”者,“附”也。溯其渊源,近可追至《字林沪报》的“附张”,远者则是《申江新报》的“报屁股”。顾名思义,“附张”只有依附“正张”才能存在;“报屁股”更是位卑言轻,只能在报纸的边角角落讨生活。总之它们原本都过着“寄人篱下”的日子,只有到了孙伏园手中,才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与能力,才能摆脱昂首跻身于报纸之林。做“附张”时只能吸纳些文人雅士们的无病呻吟,字里行间浸透着粉香与铜臭;独立后则高高扬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,以介绍新思想、新知识、新作品为其宗旨。《晨报副镌》这种从内到外彻头彻尾的焕然一新,使它的出现在报纸副刊史上具有了“里程碑”意义。

其实,在《晨报副镌》之前,已经有两块虽无副刊之名而行副刊之实的报纸版面办得卓有成就。它们一是附于《时事新报》的《学灯》,一是附于《民国日报》的《觉悟》。《学灯》最早的得意之作是发现了天才诗人郭沫若,继之又刊发了郁达夫的第一篇小说《银灰色的死》。在宗白华主编时期,《学灯》以关注新诗地名,多次以专辑组织新诗理论研讨,曾一度拥有“左右学术界势力”的《觉悟》由邵力子主编,陈望道助理。1920年扩展篇幅后,辟出“评论”、“讲演”、“译述”、“诗”、“小说”、“剧本”、“通信”、“随感录”等多种栏目,内容丰富多彩兼容并包,撰稿人多为当时名流俊彦如蔡元培、胡适、章太炎、李大钊、叶楚傖等。该刊着力于文艺译著,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的介绍,因大量发表相关内容的重量级文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由于对新文学贡献巨大,《学灯》与《觉悟》虽未“独立”也未以“副刊”名

之,却与《晨报副镌》和《京报副刊》一起,荣获“民国四大副刊”之誉——这是后话。

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份“名正言顺”的报纸副刊,《晨报副镌》为我国现代文学立下的第一奇功,是催生了千古名作《阿Q正传》。在鲁迅心中,阿Q早已存活数年,却“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”。是孙伏园锲而不舍地约稿,让他“忽然想起来了,晚上便写了一点,就是第一章;序。”“第一章登出之后,便‘苦’字临头了。每七天便须做一篇。”因为孙伏园的登门催稿,是雷打不动的每周一次:“先生,《阿Q正传》……明天要付排了。”笑嘻嘻的面容,真诚而热切的语气,拒绝是不大可能的,“于是只得做……终于又一章”。鲁迅回忆说,“《阿Q正传》大约做了两个月,我实在很想收束了,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,似乎伏园不赞成,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,他会来抗议,所以将‘大团圆’藏在心里,而阿Q却已渐渐渐向死路上走。到最后的一章,伏园尚在,也许会压下,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,但是‘会逢其适’,他回去了,代庖的是何作霖君,于阿Q素无爱憎,我便将‘大团圆’送去,他便登出来。”所谓“他回去了”,指的是孙伏园回故乡绍兴探亲,“待到伏园回京,阿Q已经毙了一个多月了”。

从《阿Q正传》的生产过程可以看出,鲁迅对孙伏园的约稿能力颇为赞许。他的阿Q被孙伏园“笑嘻嘻”地捕去之后,另外许多文化名人的“随感录”们也源源不断地做了“笑嘻嘻”的俘虏。原来的《晨报》第七版有“小杂感”、“文艺谈”、“浪漫谈”等栏目,均为登载“随感录”而开设。该数篇在《晨报副镌》上得以保留并发扬,数百篇“随感录”被孙伏园“笑嘻嘻”地催促着相继问世。这些文章多出自名门,而且都是白话文,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。从立意到表达,从内容到形式,《晨报副镌》新意盎然生机勃勃,通体洋溢着大开发大创造大建设的“五四”精神。

在《晨报副镌》干满3年,孙伏园挥手离去,随即接受《京报》主编邵飘萍之邀,于1924年12月5日另创《京报副刊》。同在《晨报副镌》时一样,他“笑嘻嘻”地招揽来一大群风头正劲的文化人,很快把《京报副刊》办成了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日报。鲁迅的《未有天才之前》的《忽然想到》《咬文嚼字》《并非闲话》等数篇文章,都初发于此刊。许钦文、黎锦明、陈学昭、冯沅君、闻一多、朱湘、余上沅、高长虹等人的小说、诗歌、剧本、散文也齐集拢来,把一份《京报副刊》装点得五彩缤纷粉枝繁叶茂。孙伏园还别出心裁发起“青年爱读书十部”与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征文活动,又配合实事推出“上海惨剧”、“沪汉后援”、“救国”、“反抗抗日强

叶圣陶信谈文学研究会

□徐 俊

1972年10月,杨冠珊致信叶圣陶,询问文学研究会诸事。叶老以78岁高龄,用毛笔正楷写了5页长函回复,对所询问题一一作答。

冠珊先生惠鉴:

承赐长函,于昨日转到,读罢甚感。今提笔答复,须先致歉,缘将使足下失望故。

我年七十八,记忆力早衰退,近年尤甚。来示谓我于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知识》皆曾撰文叙文学研究会之事。此已全不记忆。今读尊书,乃仿佛忆之,然所叙者为何,莫从追想其分毫。惟有一事则记之极真:《文学旬刊》系附刊于《时事新报》,非《民国日报》之副刊也。

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生。当时邀集发起人,在北京成立,皆郑先生主之。曾有宣言一篇,记是周作人所撰,刊于《小说月报》,今无从觅五十余年前之旧杂志矣。

我虽为此会之发起人,未尝参加其会议。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,未复举行其他会议。若是,则此会之组织松散,可以想见。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,惟在出一套丛书,以及编辑《文学旬刊》(后改为《文报(学)周报》)而已。至于《小说月报》,则为商务印书馆所出,编者先为沈先生,后为郑先生,而并非文学研究会之专属刊物也。

承提起《倪焕之》,良为惭愧。如此幼稚浅薄之作,何足挂齿。手头无此作之自存本,请言其所以。抗战期间,我迁川八年,曾于乐山遭日寇轰炸,所携全部烧毁,其中有开明版之《倪焕之》。解放以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重印此书,初以为取致甚佳,未尝留存数册。乃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,此类书即绝迹,无从求索矣。深负足下之殷望,惶恐惶恐。

今就立示所问诸点奉答于下:

一、成立于上海,其时为一九二一年初。沈先生时在北京,我时在苏州,皆未参加成立会。二、记得《文学旬刊》曾标明文学研究会编。后改《文学周报》,由开明书店印行。至于起迄时日及出版期数,皆未能作答。三、前已奉告确有一篇宣言。内容如何,全已遗忘。四、诸人或为原来相识之朋友,或为投稿者,因投稿而相识。孰为会员,孰非会员,我不能指称。缘当时并无入会登记表,亦无会员录也。五、本系极为松散之会,似无所谓分化。各走各的路,自会之成立以至后来,固常然也。

不能足下下之望,于此再致歉意。即请大安!

叶圣陶
十月廿一日上午
信文明白如话,任何解释都似多余;只有一点,却有非补充说明之必要:改革后的《小说月报》,编者“先为沈先生”,“后为郑先生”,而“先”“后”之间,还有一个“叶先生”在,只是名义上主